

社會經濟史

陈支平 主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

大生纺织集团档案 经济分析 (1899—1947)

顾纪瑞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

陈支平

中国经济史学,又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基础领域,它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学术的探索之路,走过了百年历程。在这百年沧桑的历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既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的光辉洗礼,也经受了时代政治变迁的无端磨炼。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不经意地给甘为基石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蒙上了一层“低处不胜寒”的失落景象。

站立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所走过的艰辛而曲折的道路,不能不对我们的前辈们及同仁们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坚持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有了这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才能冲破艰难困境,逐渐步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史学已经形成了两大居于主流地位的学术流派,这就是以严中平、李文治、吴承明教授等为代表人物的“国民经济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以及以傅衣凌教授为奠基人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也称为“新社会史学派”。前者注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并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考察,通过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及其相互结合转变的研究,从中寻求中国传统社会自身蕴藏着众多的向近代化转型的能动的积极因素;而后者则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注重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为了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探索精神,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2005 年,我受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委托,组织出版了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共 20 种。丛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同仁的好评和鼓励，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学界同仁们的鼓励和建议，增强了我继续组织出版丛书的意愿和信心。恰逢此时，天津古籍出版社愿意为丛书的继续出版挑起重任，于是地利人和，这套崭新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就这样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希望通过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更广泛地开拓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更紧密地团结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学人，更加多样性地凝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打破以往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那种较为封闭的格局，使之逐步成为带有世界性意义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半个世纪前，我们的前辈们就开始了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这一探索几乎是与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学者同时进行的。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进行的注重基层社会的细部考察与宏观审视相结合，以及跨学科的学术探索，与同时代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学人们所秉持的将传统的历史学与地理学、经济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相结合，把治史领域扩展到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层面，使得历史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联系更加紧密，其学术意趣实有许多相通之处。然而由于 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和国外学界缺少应有的交流，因此与年鉴学派在欧洲史学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相比，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显得沉寂。如今，在国际学术界，“科际整合”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边界更加模糊，在互相渗透和融合中产生了许多新兴学科的生长点。可以预见，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在国际的学术交流中显露出应有的互动与影响力。

这就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丛书》的责任与光荣，让我们热切地期盼着它的成长和壮大吧！

序 言^①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以大生集团档案资料为根据，以大生三家纺织公司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集。论文集内容丰富、思路清晰、论证缜密、文字朴实，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与众多的有关大生纺织公司历史的著作相比，我个人以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抓住了重点。

张謇一生创办了数十家企业，其中南通大生一纺、启东（崇明）大生二纺、海门大生三纺是骨干企业，是全部实业的根柢。本论文集深入研究这三家公司创办、兴旺、中衰、复兴的全过程，的确是抓住了张謇实业活动和南通近代化事业的重点。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有两点值得介绍。

一是量化法的广泛运用。作者从档案资料入手，整理历年账略，

^① 此序言原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科学委员会委员茅家琦教授五年前为笔者所撰内部版《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档案经济分析》一书所写的序言。此次在原书基础上增添了四篇文章并更改为现在书名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公开出版，由笔者征得茅教授同意，原序言仍作为本书的序言。

重新编制了前后统一的、各厂统一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在此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量化分析。三家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如实收资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股东权益、利润、成本和费用等,都逐年核算出确切的数据。通过量化分析,展示出启东(崇明)二纺长达十年的辉煌期。在这段时期以内,所获利润为同期实收资本的三倍多。这一历史事实,在以往的研究论著中,学者是很少涉及的。

另一个值得介绍的研究方法是三个“结合”:(一)历年账略的量化分析与说略中报告的经营和销售状况结合;(二)量化分析中见到的重大问题与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结合;(三)企业经营转折关头的重大决策与创业者、主持者的经营理念结合。这三个“结合”就将整个研究水平推向更深的层次,取得新的成果。

第三,运用了新发现的档案资料。

例如作者从大生年鉴记载中发现大生三纺在1936—1938年间还发过股息2次,但未见原始资料。作者想方设法,从南通市档案馆馆藏资料中找到该厂1936年7月到1938年6月共24个月的账略。作者抄录数据,补进相关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论集体现的这些特点,不仅将大生三家纺织公司的研究水平推向深入,同时也必然为进一步研究大生集团历史和近代南通地区经济发展历史提供了更扎实的资料和理论启示。

我和顾纪瑞同志是老朋友。他出生于1932年,江苏无锡市人,曾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以来,他关注、支持、参与张謇研究工作。年过七十又四以后,体弱多病,他仍然埋头整理和核算大生三家纺织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并作出理论分析。对他的这种献身学术精神,我是十分钦佩的。我有机会向广大读者介绍这部论集更感到十分荣幸。

祝顾纪瑞同志乘胜前进,再出好书!

茅家琦

2010年2月

前 言

本书曾由张謇研究中心(南通),于2010年3月以《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档案经济分析》的书名,编印后供内部交流。当时共收入本人逐一研究三家大生纺织公司的四篇论文。

之后,本人进一步对三家公司进行综合和比较研究,于2013年写了《张謇运营三家纺织公司的创新和失误》一文,提交“纪念张謇16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承蒙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的关心和支持,建议我将相关的经济史论文汇集一起公开出版,并向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陈支平教授作了推荐。借此公开出版的机会,除将上述五篇文章收进论文集外,还将原来比较长的书名改为简短的《大生纺织集团档案经济分析(1899—1947)》。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当年并未使用“大生纺织集团”这个名称,但张謇在领导和运营三家纺织公司时,曾正式建立“大生一二三公司董事会联席会议”,后再扩大为“大生一二三公司董监事联席会议”这种组织形式(自1923年至1935年),不断开会,统一议事,作出决策,事实上是存在过大生纺织资本集团,并曾长期运营。

2010年内部版的“前言”,写了充分利用大生三家纺织公司的档

案资料,编制资产负债表,进行量化分析,在研究中注意几个结合等问题,反映了研究工作的过程和研究成果的一些特点。现除首尾两节已重写外,将原“前言”照录如下:

这四篇文稿,主要是根据三家公司的历届账略,按照统一格式代为重新编制了历年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在此基础上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再将说略和账略结合起来,对照董事会、股东会的重大决策,给企业发展状况作出基本判断。对于三家公司若干共同性问题和各家企业特有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从企业经营、资本运作的层面,以大量数据和事实为依据,归纳出大生纺织企业重要的成功经验和值得记取的主要教训。

研究是从整理企业账略入手的。《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Ⅰ)(Ⅱ)的公开出版,提供了三家公司的完整数据资料,使量化研究具备了基础条件。只有彻底理清这些陈年旧账,才能真正弄清楚三家企业的经营状况、业绩、贡献、困境的实情,而不是转述他人的看法,人云亦云。困难在于企业的会计制度前后变更了三次,货币单位也从规银(两)变为银元(元),再变为抗战胜利后急剧贬值的法币,而且累计要做95个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工作量很大,很繁复。解决的办法是持之以恒,从2006年至2009年,断断续续坚持4年,全部完成。另一个困难是我虽长于统计分析,过去只做过当代一家企业的财务分析,缺少经验。解决的办法是,一方面进一步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知识和技术,另一方面邀请高级会计师参与工作,协助我核算全部数据,确保不出差错。经过实践,从做中学习,终于完成。

现在文稿中数字比较多,让人觉得不像是研究历史的文稿。是的,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人物,要从宏观着眼,从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演变、人物的经历进行研究,而研究企业的发展史则

应从微观着眼,要从企业各种数据的变化中作出判断。因为企业发展中的数据变化,代表着财富的增值或亏损,标志着投资者利益的得或失,反映出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获得程度,以及企业成本、利润、税负的变化,等等。有了企业一系列的数据分析,对企业发展状况作判断才有坚实的基础。

随着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南通)编的《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Ⅲ)(Ⅳ)(Ⅴ)陆续出版,进一步公布了大量股东会、董事会、三公司董监联席会的记录,以及合同、信函、章程、各种规章制度,使我对大生三家纺织企业发展史的研究,从过去主要依靠说略和账略进行量化分析,进入到管理体制、产权制度、债权债务等层面的研究,拓宽了研究领域,加深了研究深度。正是对“启东二纺”张謇、张謇与银行主持的“维持会”签订的合同规约进行深入研究,对照利润分成的实际情况,以及董事会记录、重要信函的内容,才提出了比较客观的“维持会对产权制度的嬗变及实践中的两面性”的新见解。

对于股份制的运作和企业决策过程,只有将企业经济量化分析反映出来的大事,与股东会、董事会对它是如何处理的结合起来研究,才可能有深入的正确的判断。如启东二纺被迫停产之后、进入清算之前,一次股东会上少数股东怀疑账目有问题,要求查账,开始笔者误认为是少数人很情绪化,后来反复研究股东会议的速记记录,仔细核对所提意见,才看到董事长的报告是有不确切之处和夸大企业困难的倾向,难怪股东有意见。那次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依公司法办事,选出了查账人和召集人,体现了尊重股东权益、民主决策、依法办事的精神,是大生股份制实践中留下的一个正面实例。又如海门三纺从十二届向十三届过渡时,资产负债总额悄悄猛降 217 万元,缩水 29%。经过将两届分科目的数据进行比对,再对照当时股东会、董事会记录,弄清了是董事会在主动“消肿”,是有远见的举措。之所以没有引起股东们反对,是由于做到了:处事程序的合法性,时

机选择的准确性,连带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运用良好气氛的策略性。这种历史经验,放到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I)至(V)的出版,给张謇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确实如该书序言所说做了“功德无量”之事。大生档案有9000多卷,只可能“选编”,不少重要内容是无法都入选的。不过也有瑕疵,发现也有该入选而漏掉的,如海门大生三厂的账略抗战前只公布到1936年6月,而《大生纺织公司年鉴(1895—1947)》提道,至1938年为止股东发息共4次。除1932年、1934年发过2次外,推测还有2次,只可能在1936年下半年或1937、1938年发出,既然发过股息,就应该有账略,于是开始寻找这些可能存在的账略。南通市档案馆已开放网上查档,当时笔者还在美国探亲,从网上进入南通市档案局(馆)网站,找到“张謇大生档案案卷级目录”共4678条,终于从中找到了大生三厂1936年7月至1938年6月共24个月账略的3个条目。回国后专程赴南通查阅,受到南通市档案中心的热情接待,阅读了已存入电脑的相关档案文献,摘录了主要数据补进文稿。深感南通市档案中心保存的大生集团许多宝贵档案,管理、利用、服务工作做得非常好,今后应该更加重视和利用这些宝贵资源,以提高对张謇这位历史人物所创办的企业及各种社会事业所做研究的质量。

这四篇文稿,主要从企业的微观角度进行了研究,分别对各个公司就事论事的多,三家企业的对比分析只在利润总量和分配、纺机生产效率、公司重整这几处涉及,还没有来得及对三家企业进行综合和比较研究。这些是计划中的第五篇文稿要做的事。三家企业在日寇“军管理”时期被掠夺和“发还”后被汉奸侵吞,是一个重要的专门问题,四篇文稿均未涉及,关心这个问题者请阅张廷栖教授的有关论述。

现在这本公开出版的论文集,增加了对三家公司进行的综合和

比较研究,即本书首篇《张謇运营三家纺织公司的创新和失误》一文。当时限于篇幅,三家公司之间的比较分析还有一些专题没有做,与国内其他纺织企业的比较、受外商倾销纱布产品和进口外棉的影响只是扼要涉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本书还收进了三篇文章作为附录。一是《张謇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述略》。张謇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是逐步发展形成的,内容很丰富。除了已有公开出版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外,研究张謇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的文章,专题论述的比较多,在本书的五篇正文中也只是边叙边议,分散在各处提及,缺少既简略又全面介绍和分析的文章。因此特写此文,尝试以较小的篇幅,扼要论述张謇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十个方面的重要内容,附录于后以供参考。

二是2014年,张謇研究中心(南通)成立30周年,发出“我与张謇研究”征文号召。我写了《我走过的张謇研究之路》一文,讲了研究范围抓重点企业,研究内容从清理账目入手,着重研究股份制的运行特点、决策过程和重大制度演变,研究方法除广泛运用量化分析外,注意做到三个结合(数据分析与经营销售状况结合,发现的问题与董事会决策结合,企业经营转型决策与主持人经营理念结合)。

三是将《张謇创办盐垦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滩涂开发的新思路新对策的探讨》一文的一、二两部分,以辑录形式附在最后。辑录第一部分,是考虑到张謇创办盐垦农场,是为三家大生纺织公司建立棉花生产基地,在历尽艰难的创业后,开始能供应优质棉花了,不幸由于外部和内部原因,后来几十个盐垦农场都解体了;第二部分反映了广大垦区最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化和积累的问题。这些巨大的历史变迁,对于关心经济发展的读者可能有参考价值,特附于后。

这个集子还有许多不足和缺点,诚恳欢迎批评、指正。

作者

2015年9月1日

目 录

张謇运营三家纺织公司的创新和失误 / 1

一、兴办股份制企业的创新和变通 / 1

二、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得与失 / 6

三、在企业内部管理、市场营销、资本运作上的创新和失误 / 10

四、上海银团三种接管模式三种不同结果 / 16

五、结语 / 20

对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说略和账略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上篇) / 21

一、实收资本、固定资产的扩充和股东权益 / 22

二、原棉的收购、储存和改良棉作 / 26

三、产品结构、出售方式 and 市场需求的变化 / 29

四、借贷渠道、利息负担和资金投向 / 33

五、税收负担和社会公共产品 / 36

对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说略和账略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下篇) / 40

六、利润量、利润率和利润分配去向 / 40

七、工资性支出占成本和费用比例的变化趋势 / 47

八、大生一纺特有的天生港发电厂 / 52

九、财务会计制度的建立和演变 / 59

十、近代公司制度的引进、本土化和嬗变 / 73

十一、结语 / 85

附 表 / 88

附表 I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资产负债表(一) / 88

附表 II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资产负债表(二) / 90

附表 III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资产损益表(一) / 92

附表 IV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资产损益表(二) / 93

附表 V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损益对照表(一) / 94

附表 VI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损益对照表(二) / 94

附表 VII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各项开支表(一) / 95

附表 VIII 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一厂各项开支表(二) / 96

南通大生一纺公股的由来及公产清理 / 97

一、大生一纺的兴衰和公股的由来 / 97

二、新中国成立后清理公产时遇到的几个问题 / 102

三、对公私产权的几点思考 / 108

启东(崇明)大生第二纺织公司的创办、兴旺、衰落和清算 / 114

一、企业初创时期(1907—1911 年) / 115

二、经营最佳的 10 年黄金时期(1912—1921 年) / 124

三、成立维持会,盈少亏多,逐步衰落时期

(1922 年至 1933 年 8 月) / 134

四、陷入停产,进行清算和被拍卖时期

(1933 年 8 月至 1935 年) / 147

五、结语 / 156

相关链接 / 159

不让鬼子筑据点——大生二厂拆除记(施立人 撰) / 159

附 表 / 161

附表 I 启东(崇明)大生第二纺织公司资产负债表(一) / 161

附表 II 启东(崇明)大生第二纺织公司资产负债表(二) / 162

附表 III 启东(崇明)大生第二纺织公司资产损益表(一) / 164

附表 IV 启东(崇明)大生第二纺织公司资产损益表(二) / 165

附表 V 大生二厂维持会拨给大生二厂盈余款和结转亏损额表
(1924—1929 年) / 167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档案的经济分析 / 168

一、筹集资本和股东分散化 / 169

二、购地、造房和安装机器 / 174

三、借款经营和利息负担 / 177

四、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 / 180

五、资产负债总额隔年大缩水的深层原因 / 183

六、获得利润和股东分红 / 189

七、原棉采购、储存和改良棉种 / 195

八、产品销售和市场变化 / 198

九、税收负担猛增 / 201

十、工资性支出比重猛降 / 203

十一、大生三纺特有的轻便铁道 / 205

十二、董事长、经理和职员队伍 / 209

十三、结语 / 216

附 表 / 219

附表 I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资产负债表(一) / 219

附表 II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资产负债表(二) / 221

附表 III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资产损益表(一) / 222

附表 IV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资产损益表(二) / 224

附表 V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第十二届与十三届资产负债分
科目对比表(一) / 226

附表 VI 海门大生第三纺织公司第十二届与十三届资产负债分
科目对比表(二) / 227

附 录 / 228

附录一 张謇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述略 / 228

附录二 我走过的张謇研究之路
——张謇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征文 / 235

附录三 张謇创办盐垦的经验教训和当前滩涂开发的
新思路新对策的探讨(辑录) / 244

后 记 / 259

张謇运营三家纺织公司的创新和失误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在创办的许多企业中,最重要的是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有限公司。可以说,大生一纺是他在南通全部企业事业的起点,这三家纺织公司又是他全部企业事业的根基。张謇在运营这三家公司中不断创新,取得了傲人的业绩,也因决策失误,而遭受重大挫折。今天分析他运营这三家公司的创新和失误,仍有现实意义。

一、兴办股份制企业的创新和变通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引进了公司制度,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为适合国情而使它本土化,虽有粗浅或不当之处,更多的是敢于创新的尝试。

(一)从“官商合办”变为“绅领商办”

1895年在南通创办纱厂,最大的困难是愿意投资者极少,集资困难重重。后来张謇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前后两任两江总督的支持,二人同意用闲置在上海黄浦滩的20400纱锭作价25万两入股。

但由于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很腐败,名声极坏,在洽谈、估价、签约过程中,一些商人闻讯就不愿再入股。尤其是沪方集资代表潘鹤琴、郭茂之(均洋行买办)称“如用官机,则沪股不愿”,“既用官机,复请官款,沪股顿散,即有也不交”。后来潘、郭终于退出。在重重困难之中,张謇用变通办法适应国情,取得了突破。张謇早就反对名声很坏的“官督商办”,因集资实在难,不得已才接受官机,现面临沪商退出的困境,遂想出了“绅领商办”的名称,得到了刘坤一的支持。这个“领”字一般解释为由“绅”领取官机,与“官商合办”不同,能消除商人入股的疑虑。经过四年奔走,到1899年筹集商股143户,股本19.51万两,连同官机折价共44.51万两。1899年5月一厂建成投产,之后股东分到优厚的利润,入股者渐多,商股扩充到63万两。1903年盛宣怀所领的另一半20400纱锭也折价25万两转给了大生,官股增至50万两,实收资本共113万两。“绅领商办”的名称大家能接受,而且不再“派官董”了,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其实公司的性质还是“官商合办”。张謇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讲到选举董事时说:“本公司系官商合办,商股多于官股,拟请公举5人,官股举2人,商股举3人。”即不再由官方直派官董,而是改为推出人选由股东大会选举为董事,这当然也是一种进步。

(二)限制官方大股的投票权

大生集股章程规定每股1权,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欲改为中小商股1股1权,大股的投票权采取递减法,这在会上引起了争论。最后确定为,“自一股至一百股,每股一权,一百一股以上至无限股,每二十股加一权”,并明确“官股不得分析,多占权数”^①。这一制度设计,对官股、大股的投票权作了限制,维护了中小商股股东权益,在大生二纺、三纺也得到了实施。到抗战胜利后,主持大生的张敬礼也

^① 南通市档案馆、张謇研究中心编:《大生集团档案资料选编·纺织编(Ⅲ)》,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289页。以下引用本书简作“纺织编(Ⅲ)”。

是凭借这一制度,团结依靠中小股东并利用他们占投票权多数的优势,抵制了董事长洪友兰等官方代表的不良图谋,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要将公司迁往台湾和香港的企图,这是引进股份制后本土化的一个成功例子。

(三)公布账略说略和股东大会的召开

张謇亲自撰写每届“说略”(年度业务工作报告),自1901年第二届起,至1925年的第二十五届至二十七届,共24份说略,从未间断。说略随同“账略”分发给股东,这是个创举。说略留下的巨量政治经济信息和经营大生的经验教训,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张謇去世后这个传统承袭下来,改称营业(业务)报告,除抗日战争时期不齐全外,其余年份都有。

大生一纺的股东大会,直到开车投产之后第7年才举行第一次会议。有学者批评开得太迟。张謇解释:“当时尚无商部、无公司律,故不能有完全之组织,但以理想举办事,经董分任厂事,平时有事,即会议而已。”^①实际情况是1904年清政府公布《公司律》,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大生始以“股份有限公司定名,报部注册”^②。准备了两年才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还不算太迟。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股东大会并未每年举行。据查自1907—1948年41年间,有股东大会会议记录的只有18个年份,仅占43%。肯定未开会的12年,其中1927—1929年3年未开会,这有1930年股东大会上股东杨管北三次追问“何以三年不开股东会”为证;1937—1945年9年因抗日战争无法开会。还有11年究竟是没有开会还是未保存记录,情况不明。看来许多重要事项(如增资扩股、购置设备、对外投资、盈利分配等)已由董事会及一二两公司、三公司董事联席会议讨论作决定了。由于张謇的地位及威望,又因他习惯以大家长自居,他的主张很容易通过。图

^① 纺织编(Ⅲ),第278页。

^② 纺织编(Ⅲ),第283页。